

当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

——基于国际产业转移的视角

叶祥松 晏宗新

摘 要：马克思阐述了信用和银行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并从生息资本的拜物教性质出发，揭示虚拟资本的实质。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金融活动已成为国际经济的主导。发达国家利用在虚拟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控制全球产业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制约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其实质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掠夺。

关键词：马克思 虚拟资本 经济全球化 国际产业转移

作者叶祥松，经济学博士，广东商学院国民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广州 510320）；晏宗新，经济学博士，广东商学院国民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广州 510320）。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当代国际经济关系发生了由实体经济的“物质关系”到虚拟经济的“价值关系”的显著变化。国际经济关系的主导力量不再是贸易和实体经济投资这种物质关系，而是以虚拟资本流动这种“价值关系”为导向的全球化，其表现形式是大量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迅速流动。国际金融活动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作为国际实体经济活动的派生活动并为其服务，而是主导了国际经济活动。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国际产业转移，将金融服务业和控制产业链中高附加值环节作为其主导全球经济的主要手段，经济虚拟化程度不断加深；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用美元等世界货币对其他货币的支配权，通过金融活动直接获得巨额收益，所谓的金融“创新”造成虚拟经济急剧膨胀。以次贷危机为导火线的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深刻暴露了畸形发展的全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内在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吸收发达国家的大量直接投资，承接这些国家转移过来的产业，融入全球化经济，GDP 持续地快速增长。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通过控制金融市场和产业链中高附加值环节，调节全球产业资本的产业结构及分布格局，制约着发展中国家产业的转型和升级，使不同国家在全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发展的机会以及应对

金融危机的能力也不相同。因此,透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机理,提出化解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的对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的基本框架是:第一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二部分阐述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辨识当代虚拟资本多样化发展的新形式;第三部分论述全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演变的特征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第四部分分析在发达国家经济虚拟化的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的特点;第五部分概述全球实体经济推动虚拟经济的演化机制;第六部分提出政策性建议。

一、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视角,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其一,相关研究认为,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戈德史密斯(Goldsmith)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的研究,确认金融部门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之间存在共同发展的关系。^①其二,相关研究确认,金融与实体经济存在着分离的形成机制。凯恩斯^②和托宾^③等人的观点较具代表性,认为由于金融资产能够提供比实物资产更高的回报率,因而增加了金融投机行为,吸引更多资金流向金融部门,最终导致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其三,相关研究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两种不同的价格体系,进而提出“金融不稳定假设”。^④明斯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有两套价格,一套是现行产量的价格,取决于短期的预期;另一套是资本资产的价格,反映长期的预期。资本资产的价格多半由金融市场决定,而现行产量的价格多半是在商品市场上决定的。投资和资金筹措对生产能力和支付承诺的影响,将改变体系中隐含的均衡。在明斯基看来,一旦拍卖资产所有权而不是再筹措资金成为普遍现象,资产价格必然要降低到投资品的生产成本以下,投资和利润随之下降,偿还债务的危机就会演变成金融危机。

(二)从资产泡沫视角,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国外学者对泡沫问题

① R. W. Goldsmith,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②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1936.

③ James Tobin, "A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 to Monetary Theory,"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 1, no. 1, 1969, pp. 15-29.

④ Hyman Minsky, *Stabi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的研究大体上沿着两个方向。一是对发生的资产泡沫事件及现象进行定性描述和分析。如金德尔伯格从金融危机史的角度，研究经济过热过程中产生的泡沫现象。^①二是借助数学工具，建立数理模型，实证分析泡沫问题。如布兰查德（Blanchard）和韦森（Watson）、^②泰勒尔（Tirole）^③及韦尔（Weil）^④等。格兰杰（Granger）和斯文森（Swanson）通过模型，求解所有常见的理性解集，为资产泡沫的实证研究作了重要的函数设定方面的准备。^⑤我国学者对泡沫问题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也大致沿两条主线进行。一条主线是分析泡沫产生的原因及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如李晓西等引入了泡沫经济形态的中介作用，认为泡沫经济形态是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乃至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的结果。^⑥刘骏民认为，虚拟经济高速膨胀会引起灾难性的泡沫经济。^⑦另一条主线是介绍并借鉴国外学者关于资产泡沫产生的原因及相关数学模型的研究，用来分析我国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泡沫问题，注重对日本泡沫经济及东南亚金融危机成因的考察，如张灿、^⑧黄成业^⑨等。一般认为，股市和房市泡沫是信用极度膨胀的产物，这些资产泡沫与实体经济的虚假繁荣、生产过剩结合在一起，信用是实体经济与再生产过程联系的中介。

（三）从经济虚拟化的视角，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国外研究集中体现在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的解释。克赖格尔（Jan Kregel）、维伦（Charles Whalen）和雷（L. Randall Wray）等人认为，此次经济危机是典型的明斯基式的危机；而“每月评论”派的巴兰、斯威齐、福斯特（J. B. Foster）和麦克切斯尼（R. W. McChesney），以及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学派的科茨（David Kotz）、结构凯恩斯主义者帕利（Thomas I. Palley）等则认为，应该从实体经济中追寻金融危机的根源。帕利认为，由于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开创了一个工资停滞和收入不平等

① Charles P. Kindleberger, *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 A History of Financial Crises*, the second vers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89.

② Olivier Blanchard and Mark Watson, "Bubbles, Rational Expectation and Financial Marke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945, 1983.

③ J. Tirole, "Asset Bubbles and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Econometrica*, vol. 53, no. 6, 1985, pp. 1499-1528.

④ P. Weil, "Confidence and the Real Value of Money in an 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2, no. 1, 1987, pp. 1-22.

⑤ C. Granger and N. Swanson, "An Introduction to Stochastic Unit Root Proces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vol. 8, issue 1, 1997, pp. 35-62.

⑥ 李晓西、杨琳：《虚拟经济、泡沫经济与实体经济》，《财贸经济》2000年第6期。

⑦ 刘骏民：《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⑧ 张灿：《金融泡沫理论研究》，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⑨ 黄成业：《日本、东南亚国家与美国泡沫的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世界经济专业，2006年。

扩大的时代，总需求中替代工资增长对需求支持的，是债务扩张和资产价格提高。这种制度安排是不可持续的，通过债务和资产价格泡沫维持这一模式的运转，意味着一旦其动力耗尽，经济“硬着陆”会引起突发的大规模的金融危机。^①福斯特和麦克切斯尼则认为，资本积累过程出现断层，源自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非新自由主义。^②一方面，金融资本的积累已脱离生产资本积累周期，在产业资本积累进入萧条期或实体经济处于长期停滞时，金融领域成为货币资本能够继续发挥资本作用而持续扩张的场所。另一方面，无论金融资本如何远离产业资本，它所依托的基础和它的最终利润来源，还是产业资本循环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积累。金融资本的收益终究是剩余价值的再分配，是社会财富在金融垄断寡头手中的再次集中。没有产业积累过程支持的金融资本积累，必将产生金融危机。在福斯特和麦克切斯尼看来，应以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取代资本主义。赫德森认为，马克思已高度注意到虚拟资本膨胀的危害；但赫德森自己最重视的危机原因，既不是工人收入不足，也不是资本有机构成上升，而是虚拟资本强加于债务人（产业和个人）身上的金融收费日益加大，最终压垮了社会经济。^③

国内一些学者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虚拟资本的理论展开的分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强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如成思危。^④二是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进行定量检验。刘金全的定量分析表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也具有显著的反馈影响。^⑤王爱俭等认为，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两者关系是彼此背离的，实体经济并不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也未成为我国实体经济的“晴雨表”。^⑥刘骏民、伍超明对我国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分析也支持了上述观点，认为这种非对称性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市场改革的滞后。^⑦三是一些学者试图扩大两者关系的研究范围。如林左鸣认为，由实体经济衍生而成的各种金融活动是一种狭义的

① 托马斯·L. 帕利：《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对危机解释的局限性》，陈弘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8期。

② 约翰·B. 福斯特、罗伯特·W. 迈克切斯尼：《结构凯恩斯主义对国际金融危机解释的局限性》，王静、许建康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0期。

③ 迈克尔·赫德森：《从马克思到高盛：虚拟资本的幻想和产业的金融化》，曹浩瀚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9、10期。

④ 成思危：《虚拟经济探微》，《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⑤ 刘金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关联性的计量检验》，《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⑥ 王爱俭、陈杰：《中国虚拟经济规模适度性研究》，《财贸经济》2006年第4期。

⑦ 刘骏民、伍超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模型——对我国当前股市与实体经济关系的一种解释》，《经济研究》2004年第4期。

虚拟经济，他转而提出了与广义虚拟价值相对应的广义虚拟经济。^① 刘骏民、王千尝试用虚拟经济的理论分析国际经济，目前还只是提出了研究的初步设想。^②

从已有的相关文献来看，论题研究的内容随着经济虚拟化程度的不断深化而逐步深入。国内的研究多局限于现象描述，国外研究着重金融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机理分析，集中在美国经济体内，且观点之间存在较多的分歧。在当前全球化中经济虚拟化程度加深及其作用范围不断扩大的情形下，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相互作用机理的关注不够，尤其是关于国际产业转移对全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缺乏研究。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并提出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二、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及当代虚拟资本的多样化发展

（一）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的基本理论

马克思的《资本论》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外壳内，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之矛盾的演变是沿着资本积累的轨迹展开的。他指出，在市场竞争的强大压力下，与单个资本家手中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积聚相比，由许多小资本联合成大资本或少数资本家剥夺多数资本家的资本集中，“在一夜之间集合起来的资本量”，“速度更快，从而成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使分散的、按习惯进行的生产过程不断地变成社会结合的、用科学处理的生产过程”。^③ 资本积累的自然过程奠定了资本主义积累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性：“它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因而要求国家的干涉”；^④ “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⑤ 我们应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二百年来的演进中，认识虚拟资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反过来说，也不宜离开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发展的矛盾而泛议基本矛盾的发展问题。

马克思指出，单个生产者手中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的前提，这种原始积累构成资本的前史；但在这一生产方式自身扩大再生产的资

① 林左鸣：《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② 刘骏民、王千：《从虚拟经济的角度重构国际经济理论——当代国际经济关系的新发展对中国的启示》，《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第11期。

③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89、688页。

④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96页。

⑤ 《资本论》第1卷，第831页。

本积累过程中，现代信用事业作为“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悄然发展起来，^①“它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形式”，“又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②信用制度的基本形式包括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结晶。“银行制度，就其形式的组织和集中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精巧和最发达的产物”。^③

信用和银行制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进的重要促进作用，正如马克思概括及笔者据此阐发的，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社会资本的集中分配。“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把社会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积极发挥作用的资本交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支配，以致这个资本的贷放者和使用者，都不是这个资本的所有者或生产者。”^④换言之，信用和银行制度将分散在个人手中的现实或潜在的借贷资本及货币，转化为由银行家掌控的“社会资本”。^⑤（2）利润率平均化的中介。单个资本占有的剩余价值的平均化，致使其占有的利润取决于社会总资本占有的剩余劳动总量；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获得比它实际生产的剩余价值更高的利润，这是资本不断进行技术改良和变革的重要激励机制。“资本的这种社会性质，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有了充分发展时才表现出来并完全实现。”^⑥利润率平均化的机理机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3）以信用来节约和代替货币。结果，“由于信用，流通或商品形态变化的各个阶段，进而资本形态变化的各个阶段加快了，整个再生产过程因而也加快了。”^⑦（4）促进了股份公司的成立。“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⑧通过联合，信用制度的这一重大发展把私人资本转变为直接的社会资本，相比之下，作为借贷中介的银行资本可视为间接的社会资本。股份公司为规模经济的优势地位提供了制度保障，进而奠定了垄断资本发展的基础。股份公司将资本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为少数人提供了支配别人的资本及财产的权利，使股票成了财富的存在形式。（5）把再生产过程的伸缩性强化到极限。建立在资本与雇佣劳动对抗性基础上的资本增殖，“事实上为生产造成了一种内在的但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和限制”，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最充分利用和极度紧张。“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缓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但与此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社会方式解体的各种因素”。^⑨

① 《资本论》第1卷，第687页。

②③④⑤ 《资本论》第3卷，第685、685、686、413页。

⑥ 《资本论》第3卷，第686页，并参见第219页。

⑦⑧ 《资本论》第3卷，第493、498页。

⑨ 《资本论》第3卷，第546、499页。

总之，由于劳资对立只是在资本主义限度内消极（潜在）地被扬弃，信用制度的上述作用，既“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① 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二重性也必然在虚拟资本的地位和作用中表现出来。虚拟资本是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充分发展所必然采取的、使资本得以迅速转移及流动的形式与方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对它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历史地位不能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需要做历史的辩证分析。分析的起点应当是生息资本。

马克思指出：“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存在，生息资本就作为它的一个形式继续存在，并且事实上形成它的信用制度的基础。”^② 马克思是在揭示生息资本“直接形式”之本质的基础上，^③ 进而论述其派生形式虚拟资本运动的，不能简单地将二者视为完全同一的范畴。而现代生息资本的运动实际上又是以产业资本的循环为物质前提的。马克思写道：“生息资本只有在借贷货币实际转化为资本并生产一个余额（利息是其中的一部分）时，才成为生息资本。”^④ 这里说的“转化为资本”，是指一定时期内，经由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提供一定剩余价值的职能资本。但“在 $G-G'$ 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资本是它本身再生产过程的前提；货币或商品独立于再生产之外而具有增殖本身价值的力量，——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明显的形式。”^⑤ 这是资本关系没有内容的“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⑥

但与派生的虚拟资本发生在形形色色交易人之间的转移不同，在它的直接形式上，“生息资本是作为所有权的资本与作为职能的资本相对立的”，“按照假定，这全部交易发生在两类资本家之间，即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或商业资本家之间”，“事实上，只有资本家分为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才使一部分利润转化为利息，一般地说，才创造出利息的范畴”，利息“不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⑦ 货币资本家与职能资本家之间对利润量的分割关系，随着信用的发展，硬化为对总利润量的质的分割，即硬化为利润总量中相互独立的果实——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前者在生产过程之外，后者在生产过程以内。

就生息资本的直接形式而言，马克思通过比较一般商品交换与资本特种商品交易的区别，才使“资本商品”的特殊性质得以深刻暴露。我们将会看到，虚拟资本

①② 《资本论》第3卷，第686、687页。

③ 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442页。

④⑤ 《资本论》第3卷，第428、442页。

⑥ 《资本论》第3卷，第440、441页。

⑦ 《资本论》第3卷，第426、396、415、430页。

作为派生形式与生息资本的直接形式相比，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形，这种不同正是“虚拟”的含义之所在。

一般的商品交换是经济行为；对于买卖双方来说，发生的只是价值的形式变化，在双方手中同时保留着相同的价值，只不过在卖方以商品形式存在，在买方以货币形式存在；但无论商品还是货币，它们在交换中都发生了所有权的转移；卖者实际让渡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且使用价值最终会被消费掉，于是商品的实体和它的价值一同消失。现在资本作为特殊的商品，发生在借贷资本家与职能资本家之间的交易，是资本（第一次）单向流出和货币（第二次）单向流回的两次法律上的交易。它们“不是表现为一定系列的经济行为的归宿和结果，而是表现为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特别的法律契约的结果”，即“法律交易的结果”，现实资本再生产“中间发生的一切都消失了”， $G-G'$ “不过是现实资本运动的没有概念的形式”。^① 货币资本的贷放，“只有一方得到价值，因为只有一方让出价值”。^② 这里没有发生一般商品交换中存在的价值的形式变化，而是作为资本的货币，在没有任何等价物的情况下付出去，经过一定时间后，以货币支付的形式收回来。在资本的交易中并没有发生所有权的转移，借贷资本家在法律的保障下始终是资本的所有者，持有资本的所有权证书，代表他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相应部分的索取权。他让渡给产业资本家的只是资本这种特殊商品的支配权，其使用价值就是执行资本的职能来生产利润的能力。“资本商品有一种属性：由于它的使用价值的消费，它的价值和它的使用价值不仅会保存下来，而且会增加。”^③ 这样，同一货币额同时作为借贷资本和职能资本，取得了双重存在，并导致货币资本的双重价值。在生息资本的场合，利息率是货币资本贷放的价格，是在一定时期内因支配和实现借入资本能生产利润的使用价值职能，而向其所有者支付的一定货币额。资本这一特种商品于是就有了“双重价值”，先是借贷资本自身的价值，然后又有与其不同的、在借贷交易中的价格即利息率，这是“荒谬的矛盾”，“价格已经归结为它的纯粹抽象的和没有内容的形式”。^④ 货币资本借贷的价格即利息率，实质上是因货币资本家与产业资本家在货币资本供求关系中的竞争创造出来的。职能资本家生产的总利润如果已定，如何在量上将其分割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完全取决于资本市场上货币资本的供求平衡状态，从而是由竞争来调节的。在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变动的竞争只能说明市场价格同生产价格的偏离，以及工资同劳动力价值的偏离。这种偏离在价格的长期波动中会相互抵消，在供求平衡的状态下，它们的价格“就表现为由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规律来调节，

① 《资本论》第3卷，第390、391页。

②③ 《资本论》第3卷，第394、393页。

④ 《资本论》第3卷，第396—397页。

而不是以竞争为转移”。^①但在货币资本市场上，“竞争并不决定对规律的偏离，而是相反，除了由竞争决定的分割规律之外，没有别的分割规律”，即使在借贷资本的供求达到均衡的场合，“那种需要决定的东西本身就是某种没有规律的、任意的东西”。^②“当竞争本身在这里起决定作用时，这种决定本身就是偶然的，纯粹经验的，只有自命博学或想入非非的人，才会试图把这种偶然性说成必然的东西。”^③虽然借贷资本在货币市场上的供求变化，可以在生产过程中找到原因，虽然长期平均利息率的变动一般以平均利润率的变动为界限，但既然货币资本已是独立的资本，利息已是生产过程外独立的剩余价值形式，利息率就是“独立地决定的”，“同产业资本本身的运动无关”。^④这是信用和资本市场历来为投机欺诈活动重大舞台的根本性成因。

以上概括的马克思关于生息资本运动特殊性质的分析，适应于资本交易的一级证券市场，现在来看在二级市场交易的虚拟资本。生息资本在这两个证券市场之间的转化，使生息资本派生出虚拟资本的形式，作为货币索取权的所有权证书，“同一数额的现实货币，可以代表数额极不相同的货币资本”。^⑤“这些商品的价格有独特的运动和决定方法……会和它们的名义价值〔即最初在一级证券市场发行时购买的价格——引者注〕具有不同的决定方法”。^⑥

在生息资本的直接形式上，货币资本的让渡没有发生资本所有权的转移，借贷资本家始终持有资本的所有权证书，现在面对的资本市场涉及的则是资本所有权证书的转让，虚拟资本由此而生。马克思指出，“生息资本总的说来是各种颠倒错乱形式之母”；“生息资本的形式造成这样的结果：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资本生出。货币收入首先转化为利息，有了利息，然后得出产生这个货币收入的资本。同样，有了生息资本，每个价值额只要不作为收入花掉，都会表现为资本，也就是都会表现为本金，而和它能够生出的可能的或现实的利息相对立。”^⑦原本“这总是一种纯粹幻想的观念”，^⑧但在可以直接买卖资本所有权者证书的资本市场，却体现在资本所有权证书虚拟的（即幻想的）货币价值及其独立的运动上。虚拟的资本价值代表的对未来预期可得的剩余价值相应部分的索取权，“完全象价值符号一样，只是对价值的权利证书”。^⑨虚拟资本把生息资本的拜物教性质及其拜物教意识发挥到极致：“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作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资本会提供的收入，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⑩其实，

①②③ 《资本论》第3卷，第399、399、407页。

④ 《资本论》第3卷，第423、415页，并参见第475、473页。

⑤ 《资本论》第3卷，第576—577页。

⑥⑦⑧⑨ 《资本论》第3卷，第530、528、526、526、576页。

⑩ 《资本论》第3卷，第528—529页。

虚拟资本的货币价值始终只是资本化的收益，“也就是一个幻想资本按现有利息率计算可得的收益”。^①至此，不仅是“看不到”生息资本“起源的痕迹”，而且连同生息资本本身及其收入“和资本现实增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②

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家证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随着信用和银行制度的发达，巨额的生息资本都采取这种集中的社会形式，货币资本积累的大部分“不外是对生产的索取权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幻想资本价值的积累”。^③“这种索取权或权利证书本身的积累，既不同于它由以产生的现实积累，也不同于由发放的贷款实现的未来积累（新的生产过程）。”^④换言之，不能简单地将金融即资金的融通，完全等同于虚拟资本的运动，误以为后者包括一切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活动。由于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不同人手中以不同的虚拟形式反复出现，总体来看，虚拟资本的积累大于现实资本的积累。就周期性危机的各个阶段来看，表现在利息率涨落上的借贷资本运动，与产业资本收缩、扩张和过剩的运动，除了经济复苏和利息率达到平均水平这两个个别阶段外，“总的说来，是按相反的方向进行的”。^⑤但除非有价证券代表了破产或欺诈的企业，一旦危机的风暴过去，“这种证券就会回升到它们以前的水平”，“一个国家就决不会因为名义货币资本这种肥皂泡的破裂而减少分文”。^⑥

下面阐述马克思关于汇票、国债券和股票为虚拟资本的分析。

在职能资本家与银行资本家之间发生的商业汇票的贴现，是一种纯粹的有价证券的买卖，再加上银行汇票及其汇划，构成信用之货币基础的是汇票而不是货币。“这样，通过单纯流通手段的制造，就制造出虚拟资本”，因为“要判断汇票有多少是来自实际的营业，例如实际的买和卖，有多少是人为地制造的，只由空头汇票构成，这是不可能的”。^⑦马克思还分析了银行券的虚拟资本性质。“银行券无非是向银行家开出的、持票人随时可以兑现的、由银行家用来自来代替私人汇票的一种汇票。”^⑧对有权发行银行券的银行来说，为了信用的需要，发行没有黄金或存款准备金作为担保的银行券，这样追加的资本完全是虚拟的，与银行拥有的现实资本毫无关系。但它却可以用来贴现，用来同现实资本进行交易，这种虚拟资本比银行拥有的现实资本要大得多。

至于购买国债券，“这种资本，即把国家付款看成是自己的幼仔（利息）的资

①② 《资本论》第3卷，第530、529页。

③ 《资本论》第3卷，第532、531页。

④ 《资本论》第3卷，第576—577页。

⑤ 《资本论》第3卷，第553页。

⑥⑦⑧ 《资本论》第3卷，第531、451、454页。

本，是幻想的虚拟的资本。”^① 因为不仅“资本本身已经由国家花掉了”，而且，这种当时用于补偿国家财政非生产性支出赤字的贷款，“本来不是作为资本耗费的”，债权人只是“有权从国家的年收入即年税收中索取一定的金额”，“一旦债券卖不出去，这个资本的假象就会消失”。^②

除了汇票和国债外，信用制度最重要的发展，是以股份资本形式创造出一种联合的私人资本，即直接的社会资本，股票也是典型的虚拟资本。马克思指出，股票“如果没有欺诈，它们就是对一个股份公司拥有的实际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和索取每年由此产生的剩余价值的凭证。”^③ 与国债乃至汇票等不同，在资本市场上倒卖的股票交易，转让的是一张单纯的对股份资本预期可得剩余价值的所有权证书，即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资本市场的拜物教性质使得股票的二手交易，在客观上表现为好像就是在前述生息资本直接形式上资本特种商品的交易，甚至表现为好像直接就是现实资本的流动。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以下方面。生息资本直接形式的流出，没有发生货币所有权的转移，在法律保障的契约到期时，除了破产和欺诈，本金连同它有权索取的增殖额一起，一般能平安地回到借贷资本家手中，其本金是一笔固定的真实的货币价值额，资本商品支配权让渡的价格即利息，从而资本的收益，与利息率成正比。而虚拟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反复转让，其货币价值（名义上的本金）也在无限制的易手买卖中反复变动，“随着它们有权索取的收益的大小和可靠程度而发生变化”。^④ 这部分是因为它的价格（也就是作为资本商品买卖的市场价值），“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因而具有投机性质；还部分地因为，在现实资本的增殖程度不变，或如国债那样资本已不存在、索取固定年收益的情况下，“这种证券的价格的涨落就和利息率成反比”，^⑤ 而利息率的涨落如前所述，又完全是偶然的，取决于货币资本的供求关系。特别是证券交易所的行情，在利息率的下降单纯是利润率下降的结果时，会必然出现反而上涨的趋势。在经济停滞或危机期间，不但商业汇票代表的商品资本的货币额会大大丧失，而且货币市场的紧迫和信用的普遍缺乏致使利息率提高，有价证券价格本身也必然跌落，并进而被大量抛售，以便获得货币用于支付债务，其价格遭受双重跌落。因此，从微观看，虚拟资本的价格通常背离生息资本最初投入实体经济的名义价值，其价格变动“完全不决定于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⑥ 在生息资本直接形式的场合，资本交易中对立的两极分别是货币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目标是在既定的现实资本生产的总利润额中，确定利息与企业主收入的分割份额，与现实资本运动尚存一缕依稀可见的联系，故可称资本的“双重存在”。在虚拟资本的场合，这种联系被“彻底消灭干净了”。其货币价值在幻想中涨落的资本所有权证书，在无数个投

^{①②④⑤⑥} 《资本论》第3卷，第527、527、530、530、531页。

^③ 《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87页。

资人之间交易，但他们都不能支配这个已经投入的资本，也都不能提取它，无论证书如何在交易人之间反复易手，“这一类固定资本的所有主的变换，不会使一个国家财富中不动的、物质上固定的部分和可动的部分之比发生变化。”^①因此，“这个资本不能有双重存在”，它的现实存在只能是企业中实际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的资本。^②

马克思指出，决不要忘记，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是以社会生产资料在私人手里的垄断为前提的，“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③“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它为少数大股东“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从而别人的劳动的权利”，“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④这就是金融资本为什么格外贪婪的原因。在这里，成功和失败同时导致资本的集中，尤其是套购在危机中贬值的股票，“会作为货币财产集中的一个有力的手段来发生作用”。^⑤马克思总结道：“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⑥例如，在股份公司中，“留下来的只有管理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⑦

以上关于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文本解读，从50余条引文注释中可看出，主要取自《资本论》第三卷的第五篇。恩格斯整理编辑第三卷时劳作之艰辛，在他逝世前一年为该卷写的序言中历历在目。^⑧“主要的困难在第五篇”，之前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全书这些最重要的章节会给我造成这么多的困难”，马克思在1863—1865年间留下的这两部手稿，第三卷“只有一个初稿”，与留作第二卷的“根本不同”，大量的是马克思十分复杂的思路的随笔记录，不连贯且在散见中，以不同视角重复阐述同一论题，“甚至我也往往费很大劲才能辨认”，在手稿的许多地方可明显地看出，马克思当时“由于工作过度而得的病发作了”。恩格斯还谈到编辑中自己的身体状况，“一个人过了七十岁，大脑中的迈内尔特联想纤维工作起来迟钝得令人讨厌。要克服困难的理论工作上的中断造成的影响，再也不象以前那样容易那样迅速了。”所以，笔者以上的文本解读是否融通、达意和准确，事关重要，尚可深入探讨。从马克思写草稿的1865年到恩格斯编辑第三卷的1894年，对于近30年中资本市场的迅

① 《资本论》第2卷，第182页。

② 《资本论》第3卷，第529页，并参见540页。

③ 《资本论》第3卷，第685、497页。

④ 《资本论》第3卷，第497、496、498—499页。

⑤⑥⑦ 《资本论》第3卷，第531、499、436页。

⑧ 以下援引的恩格斯关于编辑第三卷困难的描述，均见《资本论》第3卷，第3—10页。

猛发展，恩格斯在第三卷正文的括号内及注释中做了增补。例如，他写道，“最近几年”，股票的发行采取了“新办法”，分为优先股和普通股。^①这在今天的股市早已是司空见惯的普遍现象了。可见，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背后，无疑有着当时那个时代金融及虚拟资本运动尚不发达的烙印。当代虚拟资本的存在形式及其活动方式业已呈现许多新发展，其具体特征是前人未曾遭遇的。

（二）当代虚拟资本多样化发展的新形式

我们要以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为指导，考察当代虚拟资本多样化发展的新形式，这些新形式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在当代信用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金融衍生产品，成为虚拟资本的主要形式。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资本的极大扩张，为规避风险或投机谋利而发展起来的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虚拟资本形式更加多样化，包括在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涌现的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如期货、远期、期权、互换以及许多由其衍生出来的变形品种等。这些金融衍生产品在金融市场上的价格远远高于其名义价值，作为虚幻的价值，其价格波动远离现实资本的运动，有着独特的运动方式和决定方式。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金融领域虚拟资本的形式还会不断多样化。

2. 人们投资于购买某些特殊商品的资本属于虚拟资本的范畴。这些特殊商品包括名人字画、古玩文物、集邮、名贵烟酒、手表、豪华住宅等高档消费品。人们购买这些商品的目的，无非是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或倒卖谋取暴利，这些商品的价格主要是由资本化定价形成的。它们的价格完全脱离价值，由产品的稀缺程度、人们的好奇心、市场对该产品的炒作程度来决定，可能在短期内增加几倍甚至几十倍。

3. 现实投资形成的品牌、商誉、专利、专有技术、技术标准、商业秘密、专营权、营销手段和销售网络等无形资产，也是虚拟资本的新形式。这些虚拟资本以实体资本为基础，都依附于一定的使用价值。但具有商标权的名牌产品的市场价格大大高于具有相同使用价值的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也大大高于产品的价值，而且有很大的价格弹性。这种“虚高”价格的形成，一是因为这种商品在长期市场竞争过程中，质量和信誉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同，消费者愿意支付较高的价格购买这种商品；二是因为品牌一旦形成，在市场中就获得了垄断地位，这类商品具有相对的稀缺性；三是因为品牌产品或由专利生产出来，或是有特殊的工艺和技术标准，或是产地具有独特的自然条件等。投资形成的专利、技术标准等具有虚拟资本的特性，是因为一旦某种产品通过发明创造获得了专利或形成了技术标准，在法律的保护下，其转让的市场价格也大大高于其他可替代商品的市场价格。尽

^① 《资本论》第3卷，第533页，注释3。

管专利的获得和技术标准的制定也要花费大量投资，并计入产品的成本价格，但专利和技术标准一旦获得，就会形成由法律保护的垄断，由此生产的商品能够在较长时期内（被新的专利和技术标准替代前）维持大大高于其实际价值的“虚高”价格。投资形成的特定的营销手段和销售网络，其转让的市场价格同样大大高于一般的同类交易。这部分是因为经过特殊的营销手段和销售网络交易的商品获得了消费者的认可，后者愿意支付较高的价格；部分是因为特殊的渠道和销售网络造成了难以替代的市场垄断；部分是因为消费者和供应商之间信息不对称，供应商虚报了商品的市场价格。^①

综上所述，企业无形资产倍增的转让价格，既没有增加使用价值的总量，也没有因此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完全是由于它们的特质性，造成了其市场价格的“虚高”。它们作为“智力资本”或“非物质文化资产”，凭借法律或契约赋予的特殊权力及其衍生的特殊关系，以知识形态持有对未来收益的要求权，其长期收益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它们的价格变化同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化无关，因而取得了虚拟资本的形式。

三、全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新变化

（一）全球化背景下虚拟经济发展的特点

虚拟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是国际金融活动，产业资本中也出现了经济虚拟化现象。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国际化浪潮，其标志是以生产性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国际化，伴随着实体资本的跨国流动，金融资产的国际流动主要是为前者服务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金融衍生品剧增，其发展的交易量和增长速度都快于实体经济。近20年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以跨国银行、跨国金融机构为主体的大量资金和虚拟资本的国际流动为标志，可视为虚拟经济的全球化。进入21世纪，跨国金融交易量大大超过国际贸易额和直接投资总量，跨国金融交易量已达世界实际GDP的10倍左右，而实体经济占世界GDP的比重仅为40%左右。^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作为虚拟资本，跨国金融交易、外汇、金融衍生品国际流动的目的，越来越表现为直接套取资产地区差价所带来的利益，绕过实体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为当事人创造货币收入和高额盈利。“90%或90%以

^① 参见孙冰：《钻石的“平价”冒险：万元钻戒成本可能只有三千》，《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22期。

^② 刘晓欣：《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虚拟经济全球化》，《南开经济研究》2002年第5期。

上跨国经济的金融交易，不是服务于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功能”，而是为了在资本市场上追求货币资本直接的自我增殖。^①

与此同时，中国等一些新兴经济体，一直限制国际金融资本在其辖区的自由流动。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引进的外资主要用于实体经济的直接投资，在改革开放的初中期主要集中于加工贸易，致使中国的出口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发达国家将产业链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己则控制核心技术、品牌、专利、技术标准、销售网络等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以及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其职能资本中的虚拟化程度不断加深。

信息技术革命和信息传播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普及，成为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技术支撑。^②它改变了全球经济的运行方式，促进了虚拟资本的国际流动。全球各金融市场全天 24 小时互相开放，全球范围内资金的流动瞬间即可完成。缺乏实体经济的基础，借助国际互联网，虚拟资本也能在全球范围内最大化地追求利润。全球金融市场形成了一发千钧、迅速转递和共同承担金融风险的新格局。网络化金融还极大地削弱了一些国家设置的金融壁垒，迫使这些国家积极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断完善金融市场。这些都大大推动了虚拟经济的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相互渗透以至融合，日益纳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运行体系。

列宁指出：“正是竞争和垄断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原则’的结合才是帝国主义的本质”，“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自由竞争，而是凌驾于这种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③这突出地表现在垄断资本主义战后从“规模垄断主导的市场结构向技术垄断的市场结构的转变”，^④虚拟资本当代多样化发展的新形式应运而生。列宁还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某些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⑤从国际产业转移的视角，看当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这一不平衡发展的矛盾及其形式都呈现出重大的变化。

① P. Drucker, *The New Realities*, London: Heinemann, 1989, p. 121, note 18.

② 刘晓欣：《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虚拟经济全球化》，《南开经济研究》2002 年第 5 期。

③ 《列宁全集》第 2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431—432 页；《列宁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650 页。

④ 杨晓玲、梁华：《用发展的观点理解列宁关于垄断的理论》，《教学与研究》2001 年第 7 期。

⑤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685、594 页。

(二) 虚拟经济全球化深刻影响世界实体经济的结构

虚拟经济全球化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和财富创造方式的变革,推动了实体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改变着世界经济的结构。随着经济活动中虚拟化程度的提高,经济增长从主要由劳动、资本、技术等物质生产要素的投入来推动,日益转向主要由知识、信息、专利、品牌等非物质生产要素来推动;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方式,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领域,日益转向以金融服务业为主体的虚拟经济领域。经济虚拟化,增强了发达国家对金融领域的垄断和对产业链中高附加值环节的控制,尤其是利用它们对世界金融市场的垄断和金融“创新”,获取巨额利润。

虚拟经济全球化导致产业布局的重组和分工的深化。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利用掌控的金融资本在期货、期权市场上对能源、原材料价格进行控制,同时利用品牌、技术标准等控制产业链。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靠技术创新和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来推动,其产业结构越来越高级化,以金融创新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服务业迅速膨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靠自然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不仅从事出口初级产品的生产,而且日益成为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中心。从全球产业链的分工看,产业划分正在从过去的产业分工,向产业融合中的工序差异分工、环境差异分工等方面细化和深化。^①

全球价值链的上述分工,加剧了国际贸易的不平衡,从事加工贸易的新兴经济体在西方保护主义的压力下,将贸易顺差所获外汇的大部分投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证券市场,支撑了贸易逆差国家的信用创造以及金融产品创新的滥用,加速了发达国家泡沫经济的增长。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是脱离实体经济的全球虚拟经济恶性膨胀的典型表现。它对实体经济的危害,可从美国经济危机发展的以下数据中得到印证。2007 年美国实际 GDP 增长率达近 5 年最低水平,为 2.2%。2008 年美国实际 GDP 增长率为 -0.3%,2009 年实际 GDP 增长率为 -3.5%。在经济增长刺激计划下,美国经济的复苏仍然步履艰难。2010 年实际 GDP 增长率为 3%,2011 年又回落至 1.7%。^② 2008 年美国失业率达 7.2%,为 1945 年以来最高。2009 年、2010 年和 2011 年的失业率分别为 9.3%、9.6%和 8.9%。^③ 金融和经济危机又引起了债务链的破裂和信用紧缺,证券市场和信贷疲软,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的

① 李海舰:《中国流通产业创新的政策内容及其对策建议》,《中国工业经济》2003 年第 12 期。

② 数据来源: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http://www.bea.gov/itable/index.cfm>.

③ 数据来源: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U. S. Department of Labor, http://www.bls.gov/ilc/intl_unemployment_rates_monthly.htm#Rchart1.

动荡。这次危机的震中在美国，现又跃至欧元区国家，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因为那里的信用制度和虚拟经济都不发达。

四、发达国家经济虚拟化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

最初的国际产业转移，只是发达国家为适应比较优势变化和产业升级的要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落后产业的结果。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作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导力量，跨国公司利用各种形式的虚拟资本，使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出新的特点。

发达国家利用金融市场的高度虚拟化，推动国际分工不断深化。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虚拟资本在资源整合中的作用增强，由其主导的跨国并购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规模同步增减，国际产业转移方式多样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的收购和兼并平均占跨国投资总额的2/3以上，成为全球跨国投资的主要方式。而且，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其他投资基金的重要性也在增强，2006年它们参与的跨国并购金额达158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8%。1995年跨国并购占国际直接投资总量的69.7%，此后5年间，国际直接投资持续上升，而跨国并购投资数量也随之上升。^①国际产业转移突破了原来单一的直接投资和单一股权安排，逐步形成了独资、合资、收购、兼并和非股权安排等多样化投资，及其与产业转移方式多样化并举的格局。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对品牌、技术标准、分销渠道等虚拟资本要素的控制，聚敛全球实体经济创造的价值。这引致发展中国家为摆脱控制，而推动产业向打造品牌、制定技术标准、获取发明专利等产业高端环节发展的努力，国际分工协作与竞争进一步深化。

发达国家利用虚拟资本多样化形式，控制全球价值链的分工。近20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实质，是把低端产业和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己控制产业链中高附加值的环节及产品的生产。国际产业转移的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技术创新中心与制造业中心呈现分离趋势，^②开创了技术创新中心控制制造中心的新时代。另一方面，产业链被细分到空前的程度，同一产品的不同零部件之间的国际分工，同一产品的不同工序之间的国际分工，以及“设计”、“销售”与“制作”诸环节之间的国际分工，越来越普遍。^③通过生产性服务，不同形式的虚拟资本渗透并控制了国际分工的重要环节。发达国家跨国公

① 裴长洪、樊瑛：《利用外资仍要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3期。

② 王小明：《国际产业转移与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战略》，《财经问题研究》2008年第7期。

③ 例如，波音747飞机所需要的400多万个零部件，分别由65个国家的1500个大企业和15000家小企业提供，福特汽车约2万个零部件中的绝大部分分别由不同国家的4万家中小企业提供。

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被俘获”的国际分工网络，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破坏了其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内生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后者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能力。

五、全球化中的实体经济变化推动虚拟经济的膨胀

国际产业转移带来全球资本流动，也必然推动全球虚拟经济的演化，以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层面。

其一，国际资本的流动，加速了货币金融的虚拟化。我国承接发达国家转移的大量制造业，其产品的大量出口使我国外汇储备迅速增长，大量外汇被用来购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国债等金融工具，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本来源。美国金融机构将从发展中国家中获得的大量资金，用于增加房地产贷款、汽车贷款、次级抵押贷款、信用卡贷款等，推出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产品，造成虚拟经济膨胀。

其二，能源、大宗商品、自然资源的商品价格，在金融炒作中居高不下。金融创新是连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桥梁与纽带。^①新兴经济体持续的高速增长极大地提高了对上述商品的需求，在巨大利益的引诱下，发达国家以巨资强势进入资源领域，资源资本化和资源金融化成为近30年来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在金融资产泡沫破裂之后，势头更为猛烈。金融资本对自然资源的追逐，不但大量抽取实体经济的资金，使其不能更有效地扩大再生产，而且通过提高和垄断资源价格，增加实体经济的生产成本。对实体经济的双重挤压，造成了近年来全球实体经济的历史性不景气。^②

其三，近几十年来，在国际产业体系的不合理国际分工中，发达国家产业的“空心化”，也导致这些国家虚拟经济的进一步膨胀。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造业的空心化。以美国为例，依靠国际著名品牌的支撑，耐克公司除最关键的气垫系统外，其余中间产品及组装全由海外承包商提供；通用电器公司曾明确提出，要由制造业公司转变为多元化的服务业公司。据美商务部统计，约有2500家美国公司将生产转移海外。另一方面是经济结构的虚拟化。美国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1950年的27%下降到2011年的12.2%。同期产值占比下降的，还有农业、采矿业和交通运输业，批发和零售业的产值比重则略有下降。而虚拟经济占主体地位的金融、保险和房地产服务业的占比，则从1950年的11.5%，持续上升至2009年的21.3%，2010年和2011年略有下降；职业服务与商业服务的占比也从

^① 吴晓求：《金融创新与市场监管如何匹配》，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2009年3月23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323/02166008753.shtml>。

^② 郑长军：《美国新经济研究》，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

1950年的3.5%持续上升至2011年的12.6%。二者加在一起，已经从它们过去在经济中的次要地位，迅速上升为美国经济的主体，到2011年底，二者占美国GDP的比重已达32.5%。^① 靠炒作各类资产、为其提供咨询服务的投资顾问公司、信用评级公司、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以及信息服务业，越来越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而制造业及与其紧密联系的行业则不断被边缘化。这就是美国“去工业化”的结果，也是美国经济虚拟化的结果。^②

六、结 语

发达国家虚拟经济的高度发展，制约了发展中国家虚拟经济的发展，前者引发的金融危机，又被发达国家通过金融全球化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对此，我国应特别注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在注重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着力发展现代金融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产品，从根本上改变依赖实体经济中以消耗资源、环境污染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

我国发展虚拟经济的重点是发展品牌、专利、技术标准、营销手段和销售网络等虚拟资本的新形式，以此作为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突破口，构建中国主导的产业价值链，布局于东、中、西地区的协调发展，同时注重承接国际服务业的转移，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和产业转移。要特别注重引导外商直接投资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吸引发达国家技术研发机构和国际产业链条中高附加值环节转移到我国，利用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

鉴于发达国家控制和垄断虚拟经济，乃至恶性膨胀，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的现实教训，我国既应十分重视金融创新，又要审慎地选择金融工具。我国虚拟经济发展滞后于实体经济，金融创新不足，尤其是金融工具单一，金融衍生产品缺乏，不能适应金融全球化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应加快适应我国国情的金融创新步伐，改革和完善我国金融体制及机制，发展相应的金融衍生产品，以适应推动实体经济科学发展的需要。

〔责任编辑：钱永中 责任编审：许健康〕

^① 以上数据参见：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http://www.bea.gov/itable/index.cfm>.

^② 刘骏民、宛敏华：《依赖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中美核心经济与核心需求的比较》，《开放导报》2009年第1期。

founded criticism against some doctrines of modernity. It rejects the fact-value dichotomy and draws on achievements from natural sciences to establish a new science of ethics. However, it has not touched upon the deeper idea of modernity: dogmatic rationalism. Only by abandoning the complete Gnosticism and unity of knowledge of dogmatic rationalism can we revere nature and protect the earth. The Marxist philosophy that has incorporated rational elements from the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of holism will reflect the spirit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guide us in the way toward forsaking scientific determinism, transcending materialism and building the socialist civilization of ecology.

(4) Interactions between Virtual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A Perspective from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Ye Xiangsong and Yan Zongxin* • 63 •

Marx speculates on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credit and bank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contradiction of the capitalist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reveals the nature of virtual capital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fetishism of interest-bearing capital. From the 1990s o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ctivities began to dominate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ir dominance in virtual economy, developed countries control the high-value-added sectors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and constrain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 nature of such activities is to loot and plunder developing countries economically.

(5) Economic Grow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 Perspective from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Hong Dayong* • 82 •

Over the years, China has increased its efforts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achieve balance against economic growth, thus demonstrating an orientation toward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Meanwhile, some deficiencies such as the lack of technical conditions, incomplete and unbal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manufacture as the mainstay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dominance, also leave the Chines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with peculiar features and risks. There are a variety of ways and models of promoting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We should face up to the conflicts in the course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make efforts to promot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protection of social equality and justice, avoid the social dichotomy of “green and non-green,” and reflect upon th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society.

(6) On the Social Obligations of Property Rights *Zhang Xiang* • 100 •

Besides the expropriation required for compensation, there also exist a large number of “pure restrictions without compens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in legal provisions. Such restrictions are usually regarded as the social obligations of property